

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王尚德

“爷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变卖家产，奋斗不息，直至牺牲。家人一直将爷爷的革命初心和奉献精神作为家风家训，把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英烈王尚德的孙子王中新说，自己始终铭记爷爷的革命精神，在工作和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

王尚德，1891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今渭南市临渭区）。1918年，他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望，以及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满腔热情，奔赴辛亥革命发祥地武汉，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入学后，他加入了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的利群书社，1922年7月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8月，受董必武指派，王尚德等回到陕西，在渭南赤水镇建立了陕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王尚德等人在家乡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社，并在此基础上集资创办赤水职业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为党培养干部。从1922年下半年起，他逐步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扩大到华县、三原、西安等地。

1925年10月，在王尚德指导下，陕西最早的农民协会渭南东张村农民协会成立。同年12月，他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赤水特别支部书记。

1926年，王尚德赴黄埔军校，在政治部宣传科工作。1927年春，他到达西安，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负责筹备建立陕西省农民协会。

大革命失败后，王尚德受到匪特严密监视，处境险恶，他按照组织指示转入地下斗争，先后在崇德、高塘地区创建苏维埃，开展兵运工作。1928年春，他参加渭华起义，起义部队在河南邓县被打散后，在当地坚持秘密斗争。同年当选为中共豫西南特委委员，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1933年冬，王尚德返回家乡继续办学，

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西安事变期间，被任命为陕西省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把子女和大批学生送往延安。

王尚德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1941年5月，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了王尚德，逼他供出渭华一带党的组织。在国民党秘密设置的特别监狱里，王尚德经受了皮鞭、老虎凳等各种酷刑的折磨，但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在各方压力下，王尚德获释出狱。

出狱后的王尚德不顾个人安危，不惧敌特威胁，毅然留在渭南坚持斗争。1946年8月13日，国民党军统特务以卑劣的手段，将王尚德暗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王尚德为革命所作的杰出贡献，当地党委和政府修建了王尚德烈士陵园。在陵园里，展示着王尚德在任赤水团支部书记和赤水特支书时与团中央来往的书信。这些书信穿越历史的尘埃，向无数前来瞻仰的干部群众诉说着革命的初心。

李浩

人物春秋



他是大盐商家的“少爷”，也是小说《红岩》中英雄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他是渣滓洞英勇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满腔柔情的赤子。他就是罗世文，中国共产党优秀共产党员，著名烈士。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04年出

生在当地一个颇具盛名的大盐商家庭。但就在他出生那一年，由于清政府横加税额，其父破产入狱，而后病死狱中。罗世文自幼丧父，受尽歧视和冷遇，但他牢记母训，发愤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罗世文与弟弟罗世良、罗世法等于十余人组织起“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1923年夏，罗世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重庆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4年，罗世文与杨闇公、萧楚女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等进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赴苏

罗世文：《红岩》英雄许云峰原型

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1933年，罗世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过批评，遭到非法关押。长征途中，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他们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到平反。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和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1946年8月17日，敌人放话说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到南京监狱。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的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墓碑碑文。

曾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史志办主任的冷国文参与了罗世文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说：“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阅读罗世文那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切感受他英勇无畏的革命风范的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加可亲可敬的罗世文。”

罗世文重情，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他对母亲也怀有一片深情。由于长年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罗世文没有时间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思念儿子，每天就朝门口望着大路叫：“自元（罗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呀？”1944年中秋节，身陷囹圄的罗世文从亲友口中知道此事后，倚着铁窗，写下《无题》一首：“慈母千行泪，顾儿百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

童芳

一台缝纫机背后的故事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台缝纫机：赭色，机长93厘米，宽45厘米，高103厘米，上雕镂有“SINGER”的字样。这台进口的缝纫机，是缝制工人万国生在南昌起义期间使用过的。弹指一挥间，穿越92年的风云岁月，这台缝纫机承载着一段光荣而厚重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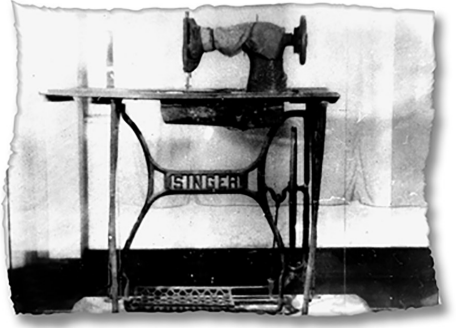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各界民众为革命的士气所鼓舞，大批工人、学生和农民踊跃报名参加，其中仅报名参加的学生就达六七百人。军服一时供不应求，需要临时赶制。为此，南昌的缝制工人迅速聚集起来，组成了一支缝制队伍，为战士们赶制军服。

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进军广东。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军计划，缝制工人要在部队撤离南昌前把军服赶制好。时间紧，任务重，为此，他们几乎顾不上休息，没日没夜地赶工。

那时，缝制工人使用的是这种老式脚踏缝纫机，工作强度可想而知。紧张的劳作，缝制工人们眼睛看花了，脚踩酸了，腰背也疼痛不已……万国生便是众多忙碌身影中的一个。

作为当时南昌市固路一名普通的缝制工人，万国生对于起义军战士进驻南昌的情形，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战士们用我们的东西、买我们的东西，一点也不亏我们老百姓。记得那时天气很热，有许多战士拿长裤子到我的店里改成短裤穿，从没少给过一分钱。而且，剩下的布料也全给了我。”

在万国生的印象中，战士们非常守纪律，从不拿老百姓一分一毫，而且乐于和民众打成一片。战士们的亲民爱民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南昌民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支援部队战士，整个南昌城的革命氛围空前高涨。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收藏的万国生使用过的缝纫机

1958年，万国生将自己使用过的这台缝纫机捐赠给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虽然缝纫机早已锈迹斑斑、板面龟裂，但缝制工人为革命付出的心血和贡献是无法磨灭的。缝纫机作为南昌起义这段历史的载体之一，在岁月的沉淀中呈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它见证了南昌民众拥戴人民军队的一片赤诚之心，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乐章。

何剑芳 戴和杰

杨绛与陈衡哲都是中国现代文坛的著名才女，二人相识于1949年，那时她们都住在上海，彼此相识之后，都感觉对方很谈得来，相互之间走动得就密切了。于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两个人经常在陈衡哲家促膝相谈，像是一对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有一天，杨绛又到陈衡哲家去了，恰好那天晚上，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有事外出应酬，杨绛便陪着陈衡哲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在吃饭过程中，陈衡哲告诉了杨绛一个秘密。杨绛后来在文章中记述道：“我们吃得少，也吃得慢。话倒是谈了很多。谈些什么现在记不起了。有一件事，她说欲说还止，又忍不住要说。她问我能不能保守秘密。我说能。她想了想，笑着说：‘连钱钟书也不告诉，行吗？’我斟酌了一番，说‘可以’。她就告诉了我一件事。”

陈衡哲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杨绛，而杨绛也说到做到，对钱钟书也没有说这件事。接着看杨绛的记述：“我回家，钟书正在等我。我说：‘陈衡哲今晚告诉我一件事，叫我连你也不告诉，我答应他了。’钟书很好，一句也没问。”

陈衡哲告诉杨绛的这个秘密，杨绛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真的做到了守口如瓶。2002年的一天，杨绛写了一篇回忆自己与陈衡哲交往的文章，在文章中谈到了这件事，但她依然没有交代这是个什么秘密，只是说：“既

是秘密，我就埋藏在心里。事隔多年，很自然地由埋而淡忘了。我记住的，只是她和我对坐吃饭密谈，且谈且笑的情景。”

杨绛真的把这个秘密淡忘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你看杨绛九十多岁写的那些回忆性的散文，能把儿时的一些细节一一记起，说明她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因此，对陈衡哲当年告诉她的秘密，她是不可能忘记的。她在文章中“淡忘了”，不过是一种说辞而已；而真正的原因，是要继续为陈衡哲保守这个秘密！

陈衡哲向杨绛讲这个秘密的时间，是在1949年；陈衡哲死于1976年；杨绛提到这件事的那篇文章，写于2002年。也就是说：当杨绛在文章中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距离陈衡哲告诉她那个秘密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三年；而陈衡哲也已经去世二十六六年了；与那个秘密相关的人员应该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杨绛在文章中把那个秘密透露出来，从情理上来说也不为过。但杨绛并没有那么做，她依然忠实于自己当年对陈衡哲许下的诺言，继续为陈衡哲保守这个秘密。2016年，杨绛去世，那个秘密被她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永远成为秘密了。

“既是秘密，我就埋藏在心里。”杨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老辈学人的为人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慕、仰望。

唐宝民

永远的秘密

往事

佛系诗人王维，竟靠弹琵琶上位？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丰富的政治制度，其中有许多对官员的管理制度，包含了要求官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内容。

任职时须报告有回避的亲属

古代任官实行避亲制度，规定有嫡系亲属关系及母家、妻家近亲关系者，不能在一个官衙中任职，或不能在一个地区的不同官衙中任主要官职；中央高级官员的亲属不得在京师及附近任府官，职卑者要回避，改任他官，以避免和防止官场中的徇私舞弊行为发生。

宋代为避免违规和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规定在官员被任命时，个人都要填一份称之为“射阙状”的表格，详细说明自己在所任职衙门上下级关系中，或与本衙门行政业务联系密切的有关机构中有无要回避的亲属，保证“如后异同，甘俟朝典”。此外还要有两名官员作保，为其写出书面的“保官状”证明。倘若官员“射阙状”故意隐瞒真情，一经查实，要受杖一百，予以惩罚；“保官状”材料失实，作保官员也要受法惩处。

家中遇有尊长之丧须报告

古代实行了丁忧之制，规定官员遇有父母等尊长之丧，须暂离职而在家居丧守制。清代规定，官员家中如有此类情况，必须及时报告。官员匿丧不报的，革职处理，不准援救。呈报丁忧迟延者，罚俸一年；漏报紧要字样者（如继母、嫡母、生母、慈母之类，是否嫡孙之类，古代亲属称谓十分复杂，生母未必是嫡母，而慈母则用于这种情况，即妾所生之子之母），罚俸六个月。官员也不能为了规避避缺、补缺等目的捏报丁忧，违者革职。闻丧不报，擅

自离任者，降二级调用。

年度考核须报告所犯过失错误

古代对官员实行考课制度，依据法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唐代规定：“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其优劣，定位九等考第”。宋代规定，受考核的京朝官（京官和升朝官的合称，宋代文臣通直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文武官员总称升朝官，通直郎、修武郎都为正八品官）将本人考课期间的言行记录，进行回顾与检讨，如有犯有错误必须悉记，不得规避漏写。负责考核的官员进行核对，如发现漏写，受考核的官员要受相应处分。

离开工作岗位须请假报批

古代的请假制度规定，官员不能正常上下班或因公离境须请假报批。宋代规定，官员有病有事不能上班，均需请假。请假的报告称为“曹状”。如果未上班又不报“曹状”，就要罚俸或给予行政处分。清代规定官员必须遵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各省官员因公离境必须履行严格的报批手续，若谎报公出离境，会受相应之处分。官员若有应早报告的情况，应将具体情况及缘由告知管门太监，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官员无故散值过早者，罚俸六个月。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官员的管理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制度，对官员须报告的事项有明确规定，且规定的内容较为具体详细，对执行的情况要进行考核检查，对不遵守规定的还要给予相应处罚，这对我们今天加强干部管理监督有借鉴之处。

杨涌生

钩沉

王维自出生起就与佛结下不解之缘，后来更是辞官隐居南山，世人都称，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王摩诘为“诗佛”。然而，在成为“诗佛”之前，王维也曾是“社交达人”，他活动于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经常是王公、驸马、权贵的座上宾。

“鲜衣怒马少年时，一夜忘尽长安花。”王维被眷顾，不是没有缘由。他写得一手好诗，又擅长书画，更重要的是，他还精通音律。而这项才艺，也对他的人生影响深远。

盛唐音乐繁荣，在唐玄宗时期更是到达顶峰。《新唐书·礼乐志》有记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宫廷如此，民间更是形成社会风尚，痴迷音乐者比比皆是。唐玄宗的几个兄弟，宁王李范、岐王李范，都通晓音律，好音乐。

十五岁时，王维离开山西蒲州，到长安谋求发展，跟现在漂在北上广的年轻人一样，背井离乡。不同的是，他在京城的日子很风光滋润。王维诗画俱佳，十七岁时便写下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很快便凭自己的才学博得了上层社会的青睐，在权贵中人缘极好。《旧唐书》中说：“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迎之。”其中，宁王、薛王更是待之如师友，岐王也非常赏识他。

这么一个“社交达人”，在十九岁又迎来最得意的时刻，他被京兆府点为头名，二十岁就中了进士。风流多才，又得贵人相助，民间的作诗者们也大受启发，将王维及第润色加工，写出引人入胜的故事。唐人薛用弱的小说《集异记》和《唐才子传》中就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当时，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名声非常大，据传官至尚书，对于王维来说，这可不是一个

好消息，因为他正好也要应举。没办法，他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岐王，请岐王帮他。岐王心生一计，此事不好硬碰硬，我来为你谋划一番。王维诗文俱佳，还弹得一手好琵琶，于是岐王就让王维抄录十首诗，准备一首琵琶曲，五日后来找他。原来，岐王是要王维以才艺吸引公主。岐王为王维准备了华美的衣服，带着琵琶，一起来到了公主府。酒宴一开，众多乐官排队进入，但王维却格外惹眼。他正值少年，风姿卓越，立马就引起了公主的注意。公主向岐王问此人是谁，岐王还卖官司，只说“知音者也”。

于是，公主便令王维独奏。王维右手弹挑，左手捺带，曲子声调哀婉，只奏得满座动容。

曲毕，公主问：“这首曲子叫什么？”王维答曰：“名曰《郁轮袍》。”

看公主为王维琵琶折服，岐王赶忙说：“此生不止善于音律，诗文也没有人能超过他。”

王维将预先准备的诗卷献上，公主翻阅后，大为惊奇：“这都是我平时吟诵的作品，原以为是古人佳作，没想到都是你写的啊。”于是把王维升上客座，以贵宾之礼相待。见此，岐王又说：“如果今年让京兆府点此生为解头多好，实在是人才啊。”公主问：“为何不让他去应试呢？”

岐王惋惜道：“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听此，公主笑了：“管我什么事呢，本来就是他人所托。”回头又对王维说：“你若取得解头，我为你尽力做这件事。”于是，公主便召试官前来。当年，王维便被点为京兆府的解头，之后还一举登第。这个故事与公主助李白得授翰林有相似之处，不过很多人认为，这是演绎出来的，并不足信。

也有人认为，虽然有虚构的成分，但这个故事也有合理性。因为王维确实有音乐天赋，才艺不凡。唐朝时琵琶艺术流行，琵琶也是宫廷乐曲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乐器。《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记载了一个小故事，王维能从画中乐师的手势，猜出画面中演奏的曲目。

王维的《郁轮袍》，也成为后来杂剧、传奇、戏曲不断演绎的一个故事。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研究，推荐王维的人究竟是谁？

而在不同时代，王维的形象也不同。有人以为，《集异记》中塑造的王维，攀附权贵，请托钻营，便专门为王维翻案，突出其真正、不畏权贵的个性。“王维读了半世书，靠人中了状元，岂不羞盖万世。”这是明朝《郁轮袍》传奇中的一句话。

王维及第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不单是因为王维，还因为它包含着人们对于文人和科举考试的理解。

唐朝科举考试，行卷之风盛行。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之所以有此风气，是因为唐朝科举考试不糊名，谁参加考试都是公开的。这也给了主考官除了试卷之外，评定考生成绩的其他途径，譬如平时的作品、声望等。因此，为了能够多些及第的可能，考生托人推荐，结交有名望的人，拜谒与考官关系密切的人便成为一种风尚。

除了王维，唐朝的诸多诗人，如

李白、白居易、杜牧等都写过行卷诗，佳作也不少。不少人认为，行卷之风促进了唐朝诗歌的发展。但唐朝科举制由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而来，发展时间较短，形式并不完善。行卷之风在选拔人才上也有不少弊病，比如缺乏统一的标准，有碍取士的公平公正，容易助生朋党等。到宋代时，科举考试走向严密，实行糊名、锁院，打破门第背景的限制，家境贫寒的人才也能够脱颖而出。

及第后，王维做了太乐丞，负责礼乐方面的工作。但同一年秋天，太乐署中有伶人擅自表演供奉皇上欣赏的“黄狮子舞”，他也受到牵连，被贬出京。之后王维在仕途中屡遭挫折，在张九龄被贬，李林甫上台后，也许是感受到政治环境险恶，他产生退出官场的想法。

年轻时积极入世的“社交达人”，渐渐倾心佛教，退隐山林，与世无争。正是这一时期，王维的创作才华大为显露，他写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并为后世传诵。对于一个文艺创作人才来说，对他有益的，也许并不是钻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今天。

袁秀月

